

劳伦斯·达雷尔的多重身份 与艺术伦理选择

徐 彬

内容提要 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混杂身份中的“殖民情结”和“殖民态度”由当时的文化、经济和鲜为人知的政治原因所决定。在自我流放的过程中，凭借对印度佛教的感悟，达雷尔完成了现实世界与虚拟文学世界的有机融合，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了作为“西方佛教徒”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 劳伦斯·达雷尔 身份 自我流放 艺术伦理选择

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 - 1990）的小说《恋人们的吹笛手》（*Pied Piper of Lovers*，1935）、《黑书》（*The Black Book*，1938）、游记《苦柠檬》（*Bitter Lemons*，1957）、成名作《亚历山大四重奏》（*The Alexandria Quartet*，1962）^①和《阿芙罗狄特的反抗》（*The Revolt of Aphrodite*，1974）等作品为回答达雷尔“为何而写作？”的艺术伦理选择提供了极佳的文本依据。“艺术伦理选择”指的是艺术家从其艺术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出发进行的伦理选择及其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的伦理旨归。青年时期达雷尔选择了离开祖籍英国，这种自我流放是他为了在反抗英国文化的同时实现经济上相对宽松惬意的艺术创作生活而做出的个人选择。不过，这一选择却为达雷尔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意外的效果，即他所到之地（希腊科孚岛和英属塞浦路斯）的人文地理环境成为其回归印度佛教精神家园的隐蔽触媒。

^① 《亚历山大四重奏》由《贾斯汀》（*Justine*，1957）、《巴萨泽》（*Balthazar*，1958）、《芒特奥利夫》（*Mountolive*，1958）和《克丽》（*Clea*，1960）四部小说组成。

一、殖民情结与混杂身份之谜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就达雷尔的作家身份界定各执一词,大致可归纳为彼此矛盾对立的两类,即认为他是“殖民作家”或“反殖民作家”。第一种观点认为达雷尔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①内的创作均服务于英国殖民政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达雷尔小说中充满了对被殖民他者的反殖诉求与斗争的讴歌,其反殖民主义的写作动机一览无余。本文认为,达雷尔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作家本人“帝国之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伦理困惑,而且,由达雷尔的小说作品反观,在殖民地写作并以殖民者身份示人的达雷尔对英国统治下的殖民世界又持批判态度,这些都使得达雷尔的作家身份呈现出混杂性与复杂性的特点。

斯蒂凡·赫博里切特认为达雷尔在塞浦路斯自我流放期间(1952-1956)扮演了殖民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并在担任英国《塞浦路斯评论》新闻官一职时致力于扩大殖民主义影响,进行政治宣传。^②大卫·勒塞尔则指出,达雷尔的办刊宗旨是“宣传英国气质,并建立塞浦路斯岛国身份”,而所谓岛国身份意味着“要么消除小岛大多数居民的希腊人身份,要么把他们变成奴隶”。^③还有学者认为埃及及后殖民语境下的达雷尔更加致力于促进英国殖民文化对东方的渗透,试图以此维系英国在黎凡特(Levant,安纳托利亚与埃及之间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构筑的文化帝国。^④

游记《苦柠檬》和小说《亚历山大四重奏》被众多国外学者视为达雷尔维护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文本证据。希腊作家鲁福斯(Rodis Roufos)把《苦柠檬》

① 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劳伦斯·达雷尔研究专家迈克尔·迪博尔指出,《亚历山大四重奏》是处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联结点上的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如将该作品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以吉卜林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后期的小说世界中,另一只脚则站在以拉什迪为代表的后殖民、后现代的小说世界中(see Michael V. Diboll, "Preface", in *Lawrence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Its Egyptian Context*,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 xvii-xxxii)。

② See Stefan Herbrechter, *Lawrence Durrell, Postmodernism and the Ethics of Alterity*,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B. V., 1999, p. 26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Postmodernism”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赫博里切特还将达雷尔比作宣扬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的外交“骗子”(diplomatic “trickster”),认为“《苦柠檬》是他招摇撞骗的把戏之一……达雷尔塞浦路斯之行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和对异国风情的向往,还是对逝去了的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印度童年的追忆”(Postmodernism: 264)。

③ See David Roessel, “‘Something to Stand the Government in Good Stead’: Lawrence Durrell and the Cyprus Review”, in *Deus Loci New Series*, 3 (1994), pp. 43-44.

④ See Mahmoud Manzaloui, “Curate's Egg: An Vlexandrian Opinion of Durrell's *Quartet*”, in Alan Warren Friedman, ed., *Critical Essays on Lawrence Durrell*, Boston: G. K. Hall, 1987, p. 153.

视为“聪明的政治宣传”，它之所以广受英国读者欢迎，是因为它让英国公众感觉良好，也就是说，不管过去犯过何种错误，当下英国的殖民政治还算不错，只有英国的继续统治才能让小岛居民免遭无政府主义的流血暴力事件及其引发的灾难。^①而约瑟夫·布恩则揭示了达雷尔隐含于《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殖民思想、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等“东方主义”情结。^②

吊诡的是，《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对现代埃及崛起的描写，又是部分国外批评家将达雷尔看作反殖民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迪博尔认为，从《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到最后一部小说《克丽》，达雷尔逐渐完成了叙述中心的“自西向东”，即由殖民叙述到反殖民叙述的转变。^③其中主要角色，即埃及科普特少数民族精英利拉和纳西姆处于大英帝国消亡、埃及独立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风暴中心，是达雷尔笔下埃及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

达雷尔的反殖民作家身份还体现在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就木的主题考察上。已故苏格兰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弗雷泽（G. S. Fraser）在评论《亚历山大四重奏》时写道：“权力！芒特奥利夫这一生几近权力的中心，然而他永远不能独立行使权力，他所能做的要么是制止（check）、要么是延迟（delay）。 ”^④“制止”和“延迟”两词高度概括了达雷尔反殖民的批判态度，即：大英帝国的殖民势力虽已是强弩之末，却仍垂死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试图阻止埃及的独立进程。

本文认为，要揭示达雷尔的混杂身份之谜，关键在于从达雷尔的人生经历出发，考察在他流放生活与艺术创作中的“殖民情结”和“殖民态度”。

出生于印度殖民地铁路工程师之家的达雷尔怀有与生俱来的“殖民情结”。在与法国翻译家克劳迪恩^⑤的访谈中，达雷尔不仅表露了儿时对父亲在殖民地工作的赞许，称“父亲是英国驻印度铁路工程师的先驱”（*Study*: 143），还展现出对当时殖民地生活的喜爱之情：“在印度随着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化，我们不停地

① Qtd. in Stefan Herbrechter, *Lawrence Durrell, Postmodernism and the Ethics of Alterity*, p. 264.

② See Joseph A. Boone, “Mappings of Male Desire in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8.1 (1989), pp. 73–106.

③ See Michael V. Diboll, *Lawrence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Its Egyptian Context*, p. 51.

④ G. S. Fraser, *Lawrence Durrell: A Stu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p. 14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Stud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 在1979年12月28日写给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信中，劳伦斯·达雷尔提及克劳迪恩（Claudine Brelet）翻译过萨缪尔·贝克特的《无言剧》（*Act Without Words*, 1956），还提到克劳迪恩与他的访谈计划（see Lawrence Durrell and Henry Miller, *The Durrell-Miller Letters, 1935–80*, Ian S. MacNiven, e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8, p. 508）。

搬家，像吉卜赛人一样住在帐篷里，总能置身于真实的大自然中……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吉卜林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① 显而易见，儿时的达雷尔还未能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与印度被殖民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童年在印度殖民地的生活也因此显得无忧无虑。

然而，12岁时，达雷尔被父亲送回英国接受所谓正统教育，这一经历在其内心引发了对出生地印度所怀有的“恋母情结”，此前对父亲的“赞许”与对印度生活的“喜爱”转变成对英国殖民者和英国文化的厌恶与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印度的那一刻也是达雷尔近乎一生的流放生活的开始。达雷尔传记研究专家麦克尼文指出，被抛弃和被背叛的感觉在少年达雷尔心底油然而生，他对英国社会和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便是这种逆反心理的产物。^② 达雷尔本人对此也有解释：“我批判英国是因为我把英国等同于父亲。一到英国，我便即刻感受到英国的虚伪和清教主义的盲目与无知……我抵制英国的一切，最主要的原因是想破坏父亲的意愿。”^③

“回国”后的达雷尔既非印度人，又非英国人，而是生活在印英之间的身份“混血儿”。在其早期自传小说^④中，达雷尔诠释了自己作为殖民者后裔或曰“帝国之子”的身份认同危机。《恋人们的吹笛手》的主人公沃尔什是达雷尔在该自传小说中的“他我”。父亲将自己回归英国家园的渴望强加于儿子身上，忽视了儿子对印度家园的认同与热爱。沃尔什虽遵循了“子从父命”的伦理规约，却陷入自己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年轻的沃尔什对同船回国的殖民者和即将到达的目的地伦敦并无好感。在沃尔什眼中，站在甲板上的帝国士兵和工程师仿佛“一群疲惫不堪的十字军战士。他们在外征战，被沙漠里的太阳炙烤、皮肤变得粗糙、体弱多病；伦敦这一地狱城里无处不在的烂泥更适合他们”^⑤。

达雷尔还以英国鞋子不适合沃尔什的脚为例暗喻沃尔什在英国的“水土不服”。伦敦拥挤不堪的交通、令人窒息的尘雾和海德公园里湿漉漉的绿色长椅与

① Claudine Brelet, "Interview with Lawrence Durrell",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3.4 (1987), p. 369.

② See Ian S. MacNiven, *Lawrence Durrell: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p. 8.

③ Lawrence Durrell, *The Big Supposer: Lawrence Durrell, a Dialogue with Mare Alyn*, trans. F. Barker, Colchester: TBS The Book Service Ltd, 1973, p. 26.

④ 达雷尔在《恋人们的吹笛手》中追忆了自己11岁至23岁期间离开印度暂居伦敦的生活经历；在《黑书》中则追忆了自己24岁至28岁期间在伦敦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和离开英国前往希腊科孚岛的旅居生活。

⑤ Lawrence Durrell, *Spirit of Place: Letters and Essays on Travel*, Alan G. Thomas, ed., Mount Jackson: Axios Press, 1969, p. 26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沃尔什记忆中美好、祥和的印度大吉岭小镇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沃尔什〕已经习惯生活于一个不同的维度，一个不同的空间。英格兰是那么狭小。”（*Spirit*: 267）面包店主与沃尔什的对话反映了沃尔什落魄艺术家的窘困生活：“这一带住着很多像你一样的穷艺术家。他们总是饥饿不堪，你也饿了吧？”（*Spirit*: 272）深夜行走在肮脏、阴暗的伦敦街道上，孤独的沃尔什感到似乎只有他晃动的身躯和身上的衣服才能让他在这“虚幻的世界”里觉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在伦敦街头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状态是沃尔什“帝国之子”身份困惑的外现。

《黑书》主人公路西弗和格雷戈里是沃尔什在达雷尔自传小说中的角色延续。初出茅庐的作家路西弗和格雷戈里希望借助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发泄对英国社会的不满，这种状态与《黑书》写作期间达雷尔写给亨利·米勒的信里描述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

在伦敦我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嫖妓——在夜总会里演奏爵士乐、写歌和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一切仿佛一场梦：破碎的酒瓶、痰、罐装食品、腐臭的肉、小便，〔屋里〕充满性病医院里的气味……我们〔达雷尔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南希〕喝酒、我们在死去。^①

达雷尔将自己弃学后混沌的英国生活片段融入《黑书》的创作之中，以己为例针砭时弊，批判了英国文化的贫瘠与伦敦现代城市生活的伦理失范。瑞·莫里森认为，“《黑书》中的女王旅馆这一巨大建筑物本身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伦敦为代表的英国生活的缩影”^②。以伦敦南部破败不堪的女王旅馆为故事背景，通过对小说主人公路西弗和格雷戈里颓废生活的描写，达雷尔揭露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之死”^③的文化及伦理危机。

达雷尔对当时享乐主义盛行的伦敦城市生活的描述无疑是对英国海外无往而不胜的殖民神话的一种反讽，也是对之后以歌颂大英帝国文化遗产为主旨的文学

① Lawrence Durrell, *Lawrence Durrell and Henry Miller: A Private Correspondence*, George Wickes, e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64, p. 60.

② Ray Morrison, *A Smile in His Mind's Eye: A Study of the Early Works of Lawrence Durre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275.

③ 路西弗“英国之死”的感叹源于对伊丽莎白时代的矛盾情感，那个原本给英国人带来极大物质丰富的时代，却滋生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挫败感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幻灭（详见徐彬、李维屏《达雷尔〈黑书〉中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第87页）。

作品的有力反拨。通过《黑书》，达雷尔批判了英国文化生产与流通领域因“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成就”而滋生的夜郎自大和“帝国没落”之际的怀旧之情以及因此造成的艺术伦理价值判断扭曲，即：部分作家和评论者仅关注能够体现“英国性”的贵族大宅与其相关文化表征，而忽视了对“帝国”晚期英国社会真实生活面貌的刻画。

以“帝国之子”的独特身份重返“母亲国”（英国），达雷尔与其他具有相似生活经历的、被“边缘”化了的殖民主义者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来自殖民地国家的英国后裔如何实现自身的文化权利，如何消解与英国正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危机意识。“在殖民地生活的英国人（包括其后裔）在英国受到冷遇，在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中没有明确的阶层归属感”^①，这对达雷尔已有的强烈无根感和落魄境况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文化权利得不到实现、民族身份得不到确立的情况下，达雷尔为了不被边缘化，主动选择了自我边缘化，或曰自我流放，这既是对英国文化的逃离，又是对其无声的反抗。

玛莉莲·帕帕亚尼斯指出：“流放”（expatriate）一词似乎和“特权”（privilege）一词紧密相连，因为只有精英阶层才具有“流动性”（mobility）；他们相对富有，能随心所欲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并将所到之处称为“家”。^②但从动因、目的地和结果等方面来看，达雷尔的自我流放与以“特权”、“享乐”或“纵欲”为核心词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的流放现象^③迥然相异。并不富有的达雷尔不具备随意选择流放目的地的能力，他的自我流放也不是东方主义者释放西方“自我”对东方“他者”的殖民政治力比多的过程^④，而是为了远离曾经自我“纵欲”的英国现代生活；因此，达雷尔的自我流放更像一个为艺术而“禁欲”的过程，在此期间达雷尔试图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禁欲”设定为自身的艺术伦理规约。

① Gordon Bowker, *Through the Dark Labyrinth: A Biography of Lawrence Durrell*, London: Sinclair Stevenson, 1996, p. 21.

② See Marilyn Adler Papayanis, *Writing in the Margins: The Ethics of Expatriation from Lawrence to Ondaatj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③ 与达雷尔几乎同时代的“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作家已将巴黎当作自己的家，在那里过着“自由、享乐、刺激、散漫的生活……这些自视甚高的文化青年不知不觉中成了一种消费道德的形象代理”（详见虞建华《“迷惘的一代”作家自我流放原因再探》，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2页）。

④ See Joseph A. Boone, “Queering the *Quartet*: Western Myths of Egyptian Homoeroticism”, in Shelly Ekhtiar, ed., *Durrell in Alexandria: OMG IX Conference Proceeding*, Egypt: University of Alexandria, 2006, p. 46. 约瑟夫·布恩在使用“力比多”（Libido）一词时，沿用了萨义德《东方学》中有关西方男性占有东方女性、殖民主义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占有的殖民主义话语模式的探讨（详见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

历经长时间居无定所的流放生活之后^①，达雷尔内心充满了对平静的艺术生活的渴望。尽管达雷尔在塞浦路斯的居住时间不足五年，然而塞浦路斯却是达雷尔由“西”向“东”的自我流放的最后一站。^② 对此地的选择主要出于经济而不是政治上的考虑，如达雷尔所说：“在良辰美景之中，手持一杯朴实的乡下人喝的葡萄酒，却硬要让人考虑那些国与国之间粗俗的争斗，无疑是件大煞风景的事；况且我是以个人名义来塞浦路斯的，我根本没思考过政治。”^③ 在塞浦路斯，达雷尔享受到了经济实惠的生活环境，美好的阳光、低廉的物价和微不足道的个人所得税让他备感舒适（see *Bitter*: 35）。

达雷尔的早期创作^④除了希图获得同行的认可之外，多半是为了满足养家糊口的物质需求，然而写作的收入不足为继，他不得不在塞浦路斯与埃及的自我流放期间担任英国驻海外殖民地的公职，并因此直接参与到此前原本不想涉足的英国殖民政治中。1955年，英属塞浦路斯殖民地秘书以官方名义邀请达雷尔入职总督府，因为他们需要一位精通希腊语并在岛上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协助处理与当地岛民的公共关系。此时的达雷尔正急需资金完成自己廉价购买的乡村别墅的修缮，这份工作无疑是一个不期而至的好运，他也因此从一个默默无闻、自我流放的作家成为一名抛头露面的殖民地官员。

但为官后的达雷尔并没有被英国殖民思想洗脑，相反，在塞浦路斯的旅居为官经历为达雷尔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让他更客观、更深刻地认识到现有文学作品中英国殖民现实的虚伪本质。他曾不无怀疑地写道：“这究竟是在对当地风土人情真实体验基础上得出的现实，还是我们〔西方殖民者们〕长期以来以本国殖民利益为目的编造的、虚构的现实？……是从我们的想象出发创造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的现实存在感，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的糟糕的文学作品？”^⑤

① 达雷尔曾于1935年自我流放于希腊科孚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沦陷后，达雷尔和妻子南希逃往埃及，先后暂居开罗和亚历山大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后，达雷尔又分别于1945年、1947年和1948年举家迁往罗德岛（Rhodes）、阿根廷城市科尔多瓦（Córdoba）和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并于1952年移居英属塞浦路斯（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wrence_Durrell#cite_ref-3）。

② 此后达雷尔曾旅居英国、埃及等地，最终定居在法国普罗旺斯（see *Study*: 24）。

③ Lawrence Durrell, *Bitter Lemon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7, p. 11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 以前期流放经历和当下生活经验为素材，达雷尔在塞浦路斯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游记《苦柠檬》的写作，并凭借此书于1957年被授予达夫库珀奖（Duff Cooper Prize）和“皇家文学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荣誉称号。除此之外，达雷尔在塞浦路斯期间还构思并完成了《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

⑤ Lawrence Durrell, *Reflections on a Marine Venus: A Companion to the Landscape of Rho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p. 17.

在此思想基础上，达雷尔在以塞浦路斯生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中抒发了带有人文批判色彩的“殖民态度”，具体表现为，作为“殖民作家”^①，他对被殖民“他者”的理解与同情引发了他对塞浦路斯政治前途的担忧和对英国在当地建立的殖民秩序的问责。

在小说《苦柠檬》中，达雷尔以“意诺西斯”（Enosis）^②为政治、历史背景，对塞浦路斯居民热议的“意诺西斯”运动和现存的“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同样的批判。弗雷泽就论述道：

尽管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一直谈论着“意诺西斯”民族主义的问题，达雷尔却不以为然。相反，达雷尔认为希腊人对英国的热爱源自对拜伦、丘吉尔和二战期间与克里特岛居民一同抵抗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入侵（Cretan resistance）的勇敢的英国年轻人的爱，这种感情远比泛希腊情绪（pan-Hellenic sentiment）强烈的多。然而，达雷尔也真切地感受到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管理太过家长式、过于殖民化，塞浦路斯应建立管辖权限更大的自治政府。（Study: 70）

如弗雷泽所述，“英国之所以紧紧抓住塞浦路斯不放，归根结底是为了英国在近东的责任”（Study: 71），而“英国在近东的责任”实际上等同于塞浦路斯作为东地中海的军事要地而对英国所具有的殖民价值。达雷尔深刻谴责了由希腊政府支持的“意诺西斯”运动在宁静祥和的塞浦路斯岛上制造的一系列血腥恐怖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使原本和谐相处的希腊裔与土耳其裔居民深陷种族斗争之中。在其中一章《无理性的盛宴》（“The Feast of Unreason”）中，达雷尔描述了恐怖事件发生时的场景：

“要流血才能争取到自由。”雅典电台疯狂地呼吁道。但是要流谁的血呢？尼科西亚^③中央警察局大门口的信箱被人放了炸弹，爆炸时街上满是去市场的人，当场炸死了一个希腊人；炸毁了的人行道上七零八落躺着13个受伤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民族党领袖向希腊社群提出警告，不

① 达雷尔的“殖民作家”身份可被理解为“殖民者”（殖民地官员）兼“作家”的混合体。

② 由祖籍希腊的塞浦路斯人所发起的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运动，由此引发了英国在塞浦路斯殖民统治的危机。

③ 尼科西亚（Nicosia）是当时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殖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岛主要商业中心。

准他们在土耳其城区犯事，种族冲突的阴影也随之扩大。酒吧、民宅、餐厅、广场，相继成为目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Bitter*: 185 - 186）

恰如本章标题“无理性的盛宴”所示，达雷尔指出，旨在使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加入希腊的“意诺西斯”运动已经从一场政治运动演变成一场无理性可言的暴力运动；恐怖分子的身份十分混杂，既有被埃奥卡（EOKA）青年组织洗脑了的年轻学生、在电台煽动下揭竿而起的本地民众，也有街头流氓以及职业或半职业军人。在暴力恐怖事件的阴霾笼罩下，“人情味逐渐在尼科西亚消逝”（*Bitter*: 187）。

“意诺西斯”运动爆发时，虽然达雷尔已在英国驻塞浦路斯的殖民政府任职，但他并未因职业身份而一味谴责“意诺西斯”运动、刻意回避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问题，更没有把英国殖民政府摆到“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相反，他认为，以希腊裔为代表的塞浦路斯民众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只看重塞浦路斯在大英帝国殖民版图上的军事战略地位^①，忽视了塞浦路斯居民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诉求：

如今我明白为什么塞浦路斯人认为希腊非常先进了……拿雅典和尼科西亚比较的话。雅典虽然错综曲折、杂乱无章，终究还是属于欧洲。但是在20世纪生活便利设施这方面，尼科西亚却只能跟某些安纳托利亚的破旧小镇相比，这类小镇位于中部大草原，茫然为世人所遗忘……有没有过叫醒它（塞浦路斯）的动作呢？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必要。（*Bitter*: 156）

达雷尔认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塞浦路斯社会经济发展的漠视源自英国当局把塞浦路斯看作帝国“财产”，英国殖民者想当然的傲慢态度、他们对塞浦路斯历史与文化的无知，与塞浦路斯人对英国历史、文化的熟知和热爱形成了鲜明反差。身为英国驻塞浦路斯殖民政府一份子的达雷尔对此深感羞愧，他的自责同时也是对英国以我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殖民统治的谴责。

往来于塞浦路斯人民和英国政府之间，达雷尔陷入友谊与殖民政治彼此矛盾

^① 在《苦柠檬》的《前言》之后、正文叙事开始之前，达雷尔首先引用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威廉姆·迪克逊（William Hepworth Dixon, 1821 - 1879）在其作品《英治塞浦路斯》（*British Cyprus*, 1887）中的评述，迪克逊强调，塞浦路斯自古以来在东西方帝国扩张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see *Bitter*: 13）。

的伦理两难；然而，出于对塞浦路斯小岛上的一草一木和当地居民的热爱，达雷尔认为因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引发的战争和殖民统治破坏了自古以来人类优良文化的传播、传承以及不同种族之间弥足珍贵的友情。在此，达雷尔已将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视为彼此间有“亲密血缘”的人，不愿看到他们之间发生屠杀，因为屠杀本身打破了某种伦理禁忌。但在“意诺西斯”和英国殖民统治两股反作用力的影响下，原本对达雷尔以朋相待的塞浦路斯岛民态度出现了逆转，尽管尚未达到憎恨的地步，但昔日的友情已化为今日的敌意；达雷尔以与小岛居民间的友谊为基础建立起的岛民身份因此而消失。这对热爱塞浦路斯、将流放地塞浦路斯视为家园的达雷尔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雷尔“帝国之子”、“英国文化批判者”、“流放作家”和“殖民地官员”等混杂身份中所蕴含的“殖民情结”与“殖民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他的流放经历息息相关。达雷尔对出生地印度怀有的“恋母情结”使其昔日“帝国之子”的自豪感被他对英国文化的抵触情绪所取代。达雷尔渴求与政治绝缘的、自由舒适的艺术生活，此后虽为生计主动参与了英国殖民的经济事业并由此获得优厚的薪水，但因对被殖民他者报以同情又游离于殖民体制之外。达雷尔在游记中审视、批评塞浦路斯本土政治问题，反对“意诺西斯”和英国殖民统治，倡导塞浦路斯自治以及种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友谊。因此，达雷尔的艺术伦理选择是对艺术家自由意志和人类大同理想的选择，然而处于个人经济谋利与殖民政治批判之间的矛盾心态之中，这种选择只能流于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自我救赎的西方佛教徒

1935年后，达雷尔离开英国，辗转、旅居希腊科孚岛、埃及、塞浦路斯和普罗旺斯等地。文若其人，达雷尔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流放者、侨民和殖民者，达雷尔也将自己以及二战期间暂居开罗的同伴称为“被抛弃的人”、“难民”和“移民”。“无根感”已成为达雷尔现实世界和虚拟文学世界的情感基调，他笔下的主人公饱受此种伤感情绪的困扰，文学评论家罗宾逊因而认为“达雷尔并没有对‘家’的矛盾感情，因为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作家”^①。事实如此，自离开印度，

^① Jeremy Mark Robinson, *Lawrence Durrell Between Love and Death, East and West*, Maidstone: Crescent Moon Publishing, 2008, p. 134.

自我放逐而远离“布丁小岛”(Pudding Island)英国之后,达雷尔从未有过定居的家园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家园真空却强化了达雷尔的精神家园意识。虽终其一生未能如愿以偿地重返印度出生地,但达雷尔却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最终实现了对作为“精神家园”的印度佛教的回归,摆脱了“无根感”的精神困境。通过写作,达雷尔以西方佛教徒的艺术家伦理身份为西方世界中的“精神疾患”开出济世良药;对达雷尔而言,救赎他人也是作家自我救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尽管达雷尔一生居无定所,出生地印度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如赫博里切特所写,“生命本身即是一种流放,人是永不止步的旅行者,不断寻找着真实的精神家园”(Postmodernism: 71)。接受采访时,达雷尔坦言:“我骨子里还留有印度的某些东西,现在,我已经 71 岁,似乎毕生都在为落叶归根而努力……印度一直在我心中,我想能有朝一日重回印度,回到我生命开始的地方。从某些方面说,印度也一直在寻找我。”^①印度的童年生活和佛教思想令达雷尔魂牵梦绕,他笔下的英国人达利、芒特奥利夫和普斯沃登都是以佛教思想为精神内核而构拟的西方人,他们所处的小说世界即是作者笔下的文学异托邦,从中反映出的是达雷尔对西方佛教徒的艺术伦理选择。

麦克尼文曾撰文写道,达雷尔的父母虽然分别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后裔,但他们和达雷尔一样都出生于印度,达雷尔一家都将印度而不是英国或爱尔兰视为自己的故乡^②:

达雷尔晚年曾任法国伯蓝吉(Plaige)噶举玲(Kagy-Ling)佛教寺庙筹建基金会委员。时至今日,该寺庙依然保存完好,并由西藏喇嘛主持。尽管达雷尔并未返回过东方,但他至少将东方的一部分带到了法国。而他的创作中也蕴含着东方佛教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自阉烂达罗(印度)的小男孩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园。^③

在《来自大象的脊背》一文中,达雷尔在认同印度自然神论、批判英国科学至上论的同时,阐发了对印度家园意识的肯定。印度人不管是市井百姓还是神职人

① Piero Sansavio, "Durrell's Himalayas: Retracing a Literary Passage from India", in *World Press Review*, 11 (1983), p. 59.

② See Ian S. MacNiven, "Lawrence Durrell: Writer of East and West", in *SB Academic Review,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Research*, vol. V, No. 1 (1996), p. 7.

③ Ian S. MacNiven, "Lawrence Durrell: Writer of East and West", p. 10.

员,既与大自然共生息,又与大自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然而达雷尔在印度接受的英国教育却告诉他要征服自然,不要与自然妥协,对此,达雷尔始终持反对态度。^①

赫博里切特认为,达雷尔对东西方世界的描摹充满象征主义色彩,东方与母亲、印度、佛教和神秘联系在一起,西方则与父亲、英国、基督教和理性相关(see *Postmodernism*: 313)。在题为《序曲》的演讲中,达雷尔以佛教对他的积极影响为主旨,概述了以印度和佛教为代表的东方和以英国和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本质差异,并指出不是气候、经济、政治和种族定义了东方,而是宗教精神:

善是不能继承的,必须以某种方式习得才行。如果住在一个佛教国家里,你会发现这经历奇妙无比。一觉醒来,你不会像在我们居住的国家里那样,担心害怕我们的邻居。自然中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这为自我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地;然而,这在刻板的、神学当道和充斥着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度里却是求之而不得的。^②

达雷尔将佛教中的无我境界视为基督教的解毒剂,并解释说:“从诗意而非神学的角度出发,我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佛教中没有个人或自我之说,这免除了基督教中可怖的自恋情结。我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从未让我感到过满足。相比之下,佛教更具逻辑性,更朴素,更可靠。”^③

达雷尔认为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在毕达哥拉斯时期已深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我们的祖先希腊哲学家们曾徒步前往新德里在印度大学里学习”(“Using”: 194)。在希腊科孚岛进行《黑书》写作期间,达雷尔对此深有感触,发出了“在希腊,我重新发现了印度”(“Using”: 194)的赞叹。达雷尔将《黑书》创作前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比作基督教侵染下作茧自缚的痛苦挣扎,恰如《黑书》

① See Lawrence Durrell, “From the Elephant’s Back”, in *Fiction Magazine*, 2.3 (1983), pp. 59–60.

② Lawrence Durrell, “Overture”, in Michael H. Begnal, ed., *On Miracle Ground: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Lawrence Durrell*,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

③ Lawrence Durrell and Jean Montalbetti, “Using the Yeast of Religion without Breathing the Word”, in Earl G. Ingersoll, ed., *Lawrence Durrell: Conversations*,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主人公路西弗源于对伊丽莎白时代的矛盾情感而发出的“英国之死”的哀叹。在《黑书》中，达雷尔指出基督教有名无实，并未充实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空虚现象的普遍存在已将英国变成 T. S. 艾略特描绘的“空心人”的国度。在达雷尔眼中，基督教因其狭隘本质而有害于人；与此相反，佛教却教人如何行善，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黑书》是达雷尔精神与道德危机的集中体现，是基督教和印度佛教两种信仰间的战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达雷尔实现了由蚱蜢、由基督徒向佛教徒的身份转变。

在《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第三部小说《芒特奥利夫》中，达雷尔为读者刻画了一位皈依佛教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老芒特奥利夫的形象，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佛教情结。主人公芒特奥利夫的父亲老芒特奥利夫是第一代东方学家，原本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身份来到印度，之后却被印度文化和宗教深深吸引，成了印度巴利语专家。老芒特奥利夫实现了西方人的印度“本土化”，他住在印度港口城市马德拉斯的佛教徒们的乡间小屋里，终日穿着托钵僧的长袍：“老芒特奥利夫属于消失了的印度，是印度特殊阶层成员，他们投身于印度佛教研究，早已忘却了为之而来的帝国荣耀……一开始他还只是宗教仪式上的裁判官，没过几年他就成了印度的佛教专家，编辑、翻译稀有的和被人遗忘了的印度典籍。”^①

达雷尔研究者大卫·伍兹认为达雷尔信仰的是坦陀罗佛教（Tantric Buddhism），它强调情爱（romantic/sexual love）是精神成长的基础，这一观点在《亚历山大四重奏》的诸多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中有所反映。^② 在《亚历山大四重奏》中，主人公们经历了在不成熟性爱观指导下的无理性的纵欲以及感情挫折后的自我反思与精神成长过程。在第一部小说《贾斯汀》中，达雷尔描写了以英国人达利和埃及人贾斯汀^③为代表的小说人物在亚历山大上流社会中毫无道德可言的声色犬马的生活。在第二部小说《巴萨泽》中，通过阅读巴萨泽医生的行间注^④和贾斯汀前夫阿诺提的小说《习俗》（*Moeurs*）中有关贾斯汀精神病史的阐述，达利认清了自己与贾斯汀的性爱关系的盲目本质。在最后一部小说《克利》中，达雷尔首先描述了感情生活屡遭失败且饱受断臂之痛的女画家克丽的不

① Lawrence Durrell, *Mountolive*, New York: E. P. Dutton, 1961, p. 97.

② See David M. Woods, "Love and Meaning in *The Alexandria Quartet*: Some Tantric Perspectives", in Machael H. Begnal, ed., *On Miracle Ground: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Lawrence Durrell*, p. 9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达利、巴萨泽、贾斯汀和普斯沃登等小说人物在《亚历山大四重奏》所包含的四部小说中反复出现。

④ 巴萨泽医生以行间注释的方式，更正了《贾斯汀》中达利对自己与贾斯汀爱情关系的错误理解。

幸，但最后以克丽和达利有情人终成眷属以及二人事业有成（克丽成为真正的画家，达利成为真正的作家）的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传统小说结尾，给《亚历山大四重奏》以情爱为主题的叙事画上了句号。这一叙事模式印证了达雷尔蕴含于小说创作中的坦陀罗佛教的情爱思想，即：情爱与心智成熟有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达雷尔借鉴的坦陀罗佛教中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中道”（Middle Path），即：逻辑分析与理性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与目的的终结，而是一个介于知与不知之间持续前进的过程——这种动荡不安的不稳定状态才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而“虚空”（Shunyata）是其中的核心经验（see “Love”：102）。东方佛教中的“虚空”观对人有积极向上的促进作用，然而该观点在西方思想中的对应表述“虚无”（nihilism 或 nothingness）则常被描述为孤独和无意义的状态，因其负面意义而引起西方人的普遍恐惧。在《黑书》中，达雷尔诠释了“英国之死”的主题，指出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思维模式试图以理性的逻辑诠释生活与文学，消除“虚无”的恐惧感，以此掩盖自身无药可救的精神荒原，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却正是导致“英国之死”的罪魁祸首，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抹杀了事物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无独有偶，除了《黑书》的主人公路西弗，《亚历山大四重奏》中英国驻埃及大使芒特奥利夫和英国情报员马斯克林等主人公均无法忍受“虚无”感，不敢面对“知与不知”的中间状态——“中道”，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一状态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稳定感，然而为他们所不知的“虚无”却能帮助真理追寻者超越有限的自我意识的阻碍。

伍兹指出，坦陀罗佛教思想包涵对两种生活状态的描述，它们分别是玛雅（Maya，生命的短暂、乏味与痛苦）和涅槃（Nirvana，本质的、不变的和最圆满的状态）（see “Love”：98）。已故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卡尔认为，《亚历山大四重奏》的前三部小说在叙事内容与时间上相互重叠，形成一种三维空间关系；最后一部小说则展现出叙事时间的进程，是前三部姊妹篇的续集。^①以卡尔对《亚历山大四重奏》的形式分析为基础，可以发现，前三部小说以时间静止感和同一故事从三个不同角度的重复讲述为叙事特征，着力描写以达利和芒特奥利夫为代表的主人公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焦虑，最后一部小说则描绘了主人公历经苦难之后的精神丰盈状态。劳伦斯·达雷尔国际研究学会资深

^① Frederick R. Karl,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41.

教授尼克尔斯将《亚历山大四重奏》比喻为“生与死的迷宫”，认为达雷尔的小说世界“介于生、死，死与重生之间……小说表面否定、实则肯定了人类生活经验中的秩序与终极意义”^①。由此可见，《亚历山大四重奏》在三个空间维度与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叙事相得益彰，从形式到主题均反映出主人公从玛雅到涅槃生存状态的转变。

达雷尔在《亚历山大四重奏》之后创作的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的叙事模式也借鉴了从“玛雅”到“涅槃”的坦陀罗佛教思想。以发明家费利克斯为代表的主人公因崇尚物质享受、追名逐利而陷入“玛雅”和“虚空”的生活状态之中。在“浮士德精神”内含的“兽性因子”的作用下，费利克斯与梅林科技公司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沦为公司的奴隶；费利克斯的妻子贝妮蒂特是公司创始人梅林的女儿和为公司牟利的性奴隶，因沉溺于物质消费而患上了“消费狂”的心理疾病。^②达雷尔以“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特喻指费利克斯的情人、妓女艾俄兰斯。费利克斯虽被公司“疗养院”以切除一部分大脑记忆中枢的方式进行了“洗脑”，但却对自己与艾俄兰斯之间完美的情爱往事记忆犹新。艾俄兰斯死后，公司总裁朱利安为满足一己私欲把她制造成类人机器人。饱受“玛雅”和“虚空”的混沌与理性缺失的痛苦之后，小说主人公以不同方式实现了“顿悟”。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自杀式反抗唤醒了费利克斯业已泯灭的“人性因子”；后者烧毁了公司档案室，消除了公司对员工非人性化的契约控制。在此，达雷尔赋予了费利克斯和艾俄兰斯“涅槃”一般死后重生^③的力量。在费利克斯帮助下，他的妻子贝妮蒂特回归正常，两人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如此结尾设置进一步体现了达雷尔对坦陀罗佛教中情爱和涅槃思想的认同。

在谈到艺术伦理的重要性时，阿诺德·伯林特指出，“艺术家的地位与教师、精神病医生和物理学家相似，他们的工作虽然不会产生直接且特殊的结果，却能形塑人们的思维模式”^④。达雷尔以其独特生平经历为背景，将自己对印度佛教的理解引入写作之中，构拟出以东方宗教哲学为精神基础的文学异托邦。隐身其中的达雷尔针对“自我中心论”、“虚无论”和“逻各斯中心论”等西方社会的

① James Nichols, "The Quest for Self: The Labyrinth in the Fiction of Lawrence Durrell", in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22. 1-2 (1995), p. 57.

② 详见徐彬、刘禹《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论达雷尔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载《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5期，第3页。

③ 费利克斯从被施以手术、忘记自我到找回记忆、重建自我的经历也可被视为一个死后重生的过程。

④ Arnold Berlant, "Artists and Morality: Toward an Ethics of Art", in *Leonardo*, vol. 10 (1977), p. 197.

精神痼疾，以佛教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指出“情爱”、“中道”和“涅槃”等核心价值理念将是医治上述疾患、化解“英国之死”之精神与道德危机的“良丹妙药”，也是救赎他人（达雷尔小说中的西方人）的有效手段。

《恋人们的吹笛手》和《黑书》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写作地点是希腊科孚岛，达雷尔将对自身“帝国之子”的身份困惑的描述与对英国的文化批判熔为一炉。“渺小、吝啬、偏颇”是达雷尔批评英国文化的核心词。达雷尔在塞浦路斯和埃及自我流放期间的作品《苦柠檬》和《亚历山大四重奏》常被人误认为带有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宣传色彩，而达雷尔本人也被打上了殖民主义作家的烙印，然而上述作品却展示出达雷尔以东西方平等为前提的“入乡随俗”的创作倾向。在达雷尔笔下，东方（以近东塞浦路斯为例）非但未被妖魔化，相反，东方和东方宗教（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思想精髓成为了达雷尔艺术伦理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其作品人物塑造和情节构思的过程之中。

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立与妥协是达雷尔混杂身份的成因，人文主义的传承，种族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与沟通是达雷尔文学创作中的艺术伦理旨归。在由“西”向“东”的自我流放过程中，达雷尔以世界大同的伦理道德理想和佛教救赎思想为核心，实现了由“东”向“西”的批评性回写。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 & ZD128）、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劳伦斯·达雷尔研究”（13CWW01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715”和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WJQ 2014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彬，男，1976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国外劳伦斯·达雷尔研究述评》（载《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困在打气筒里的猫——劳伦斯·达雷尔〈芒特奥利夫〉中的亚历山大后殖民寓言》（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8辑，2013年4月）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